

阴阳之变化的内涵。这样的解说比起纯粹的以人事、人情说诗更全面,也更符合“诗言志”的原初内涵(曹建国《由楚简“蔽志”论“诗言志”产生的年代和原初内涵》,《长江学术》2010年第2期)。因为诗通天人,所以为政者应该于“天人之际”求诗、察诗,如此方能体天心,观民俗,天人眷顾而国祚长久,故曰诗是“君德之祖,百福之宗,万物之户”,要“刻之玉版,藏之金匱”。

《诗纬》对诗的定位不神秘,其对《诗》的阐释自然也称不上神秘。如《诗纬》对《十月之交》的解释。

烨烨雷电,不宁不令,此应刑政之大暴,故震电惊人,使天下不安。(《纬书集成》,第460页)

百川沸腾,众阴进;山冢崔嵬,人无仰;高岸为谷,贤者退;深谷为陵,小临……十月之交,气之相交。周十月,夏之八月……及其食也,君弱臣强,故天垂象以见征。辛者正秋之王气,卯者正春之臣位。日为君,辰为臣。八月之日交,卯食辛矣。辛之为君,幼弱而不明。卯之为臣,秉权而为政。故辛之为言新,阴气盛而阳微生,其君幼弱而任卯臣也。(均见《纬书集成》,第469页)

十月震电,山崩水溢,陵谷变迁,民生日促。

后二年,幽王为犬戎所逐。(《纬书集成》,第487页)

君为天、为日、为阳,臣为地、为辰、为阴。君弱臣强,天便以日蚀、地震予以警示,日蚀以譬君弱,地震以譬臣强。天垂象以见征,并征之以阴阳,这便是“天地之心”,而《十月之交》也正表现了这种“天地之心”。这样的解释与汉代四家诗又有什么差异呢?甚或是毛、郑诗说也是如此。《毛传》:“月,臣道。日,君道。”《郑笺》:“雷电过常,天下不安,政教不善之征。”

不仅不神秘,《诗纬》对诗的解释也没有背离人伦道德(刘毓庆先生认为《诗纬》释诗已经背离了人伦道德,走向了通向天道的神秘之域。见其《由人学到天学的〈诗》

学诠释》,《文学评论》2005年第6期)。这一点我们可以结合《诗纬》对《关雎》的解释来加以分析。《诗推度灾》:“《关雎》知原,冀得贤妃,正八娵。”“关雎恶露,乘精随阳而施,必下就九渊,以复至之月,鸣求雄雌。”(《纬书集成》,第471页)这是对《关雎》的解说。原,本也,道也。婚姻之道在于乐其德而不淫其色,故《毛传》曰关雎“挚而有别”,解《关雎》之义为“后妃之德”,即后妃“乐得淑女以配君子,忧在进贤”。刘向《列女传·魏曲沃妇篇》:“夫雎鸠之鸟,犹未尝见乘居而匹处。”《汉书·匡衡传》载匡衡论《关雎》何以为《诗》始,其曰:“孔子论《诗》以《关雎》为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则无以奉神灵之统而理万物之宜。故《诗》曰:‘窈窕淑女,君子好仇。’言能致其贞淑,不贰其操,情欲之感无介乎容仪,宴私之意不形乎动静,夫然后可以配至尊而为宗庙主。”《易林·晋之同人》:“贞鸟雎鸠,执一无尤。”《诗纬》阐释诗义、解诗用语与上述诸说有相合之处。而所谓“恶露”则是称赏关雎能求偶于隐蔽处。《后汉书·张衡传》:“晒河林之蓁蓁兮,伟《关雎》之戒女。”《后汉书·明帝纪》李贤注引《薛君韩诗章句》曰:“诗人言雎鸠贞洁慎匹,以声相求,隐蔽于无人之处。”(《后汉书》卷二)冬至于十二辟卦图正对应《复》卦,“复至之月”即十二月,因《复》卦一阳来复,故曰“乘精随阳”,这其实也是极阴生阳的含义。

正因为如此,我们也一再强调《诗纬》诗学并没有背离正统诗学观(张玖青、曹建国《诗纬论诗》,《中南民族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它的有些表达是正统诗学观的变相,而有些则构成了正统诗学观的补充,如“诗者,持也”之类。既然如此,我们便不能对《诗纬》采取简单鄙弃的态度。该如何整理《诗纬》乃至整个谶纬资料,是一个亟需解决的问题。

[作者单位:武汉大学文学院]

制举并未促成唐代隐逸风尚

鞠 岩

《文学遗产》2009年第5期刊载《论制举与唐代隐逸风尚的关系》(查正贤撰,以下简称“查文”)一文,认为:

“为制举而颁布的诏书借助传统的隐逸话语,并灵活设置各种科目,把应举士人命名为沉沦草泽、待时而出的隐

逸之士，从而塑造了唐人的隐逸意识，直接鼓励了士人把自身多个阶段的经历描述为隐逸生活。制举所塑造的隐逸意识及这一塑造活动本身，都是唐代隐逸风尚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它的独特面貌，不宜简单视为‘假隐’。同时，帝王对其考试程序的灵活运用，使之能在实践层面上具体落实这一关系，并随着前后社会情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从而进一步充实了它与隐逸风尚的关系。”此文拟提出关于制举试之新观点。然而，笔者并不同意查文对唐代制举的理解。

唐代科举分为常举和制举。常举是按制度常年进行的科目，主要有秀才、明经、进士、明法、明书、明算等六科。其中，秀才科设置时间不长，永徽初即停废，明法、明书、明算三科选拔的又是专门人才，故而常举中最著名的要数明经和进士两科。明经科主要试帖文和经问大义，进士科则主要试帖经、杂文、策文。与常举不同，制举由天子下诏举行，名义上是天子亲试，当时称为廷试或殿试，考试时礼遇也较为隆重。制举试的科目和时间都不是固定的，而是根据一定时期的政治需要进行，通常只试策文，这是唐代科举考试的大致情况（详参傅璇琮《唐代科举与文学》，陕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吴宗国《唐代科举制度研究》，辽宁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本文对唐代科举的论述主要参考这两部著作，不再一一注明）。

唐代制举乃“天子自诏”，“所以待非常之才”（《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1159页），它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从设科到考试都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其根本目的在于选拔有高明政治见解的高层次治国人才。这一点，在整个唐代都是相当明确的。因此，制举并不能促成唐代的隐逸风尚，相反，它所塑造的是士人积极参与政治的意识。唐代制举与现实政治的密切关系至少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在科目设置上，以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军谋宏远堪任将率、详明政术可以理人等与现实政治关系最为密切的科目为主，而幽素科、高蹈丘园、高才沉沦草泽自举、哲人奇士隐逸屠钓等与隐逸话语相关的科目仅居次要地位。

《新唐书》卷四四《选举志上》云：“列为定科者，如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军谋宏远堪任将率、详明政术可以理人之类，其名最著。”（《新唐书》，第1169页）这四科与现实政治关系最为密切，涵盖了德行、政见、学术、教化、军事、行政等方面的人才，几

乎满足了君主各个方面的政治需要，集中体现了制举的根本目的和中心思想，因而最受重视，逐渐“列为定科”。其中最为著名的是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要求应试者有广博的经史知识，能提出经世治国的方略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方法，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均出自此科，其中不少人还位至宰相，执掌国家大政。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还要求应试者对时政没有保留地提出意见，因而最足以代表制举应诏直言的特点。许多士子通过对策，来揭露现实政治的各种弊病，表达自己的见解，提出解决的方法。这不但有利于选拔人才，而且会对社会舆论产生巨大的影响，充分体现了制举与现实政治的密切关系。

相反，带有征隐性质的高蹈丘园等科目则处于较为次要的地位。唯有乾封元年（666）幽素科得人为多，苏瓌、解琬、苗神客、格辅元、王勃等均登此科。其中，苗神客、王勃为著名文士，解琬为军事人才，格辅元、苏瓌皆位至宰相。此后，此类科目虽时有举行，但较少有杰出人才登科，远不能与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等科目相提并论。这是因为，此类科目只是遵循征隐的传统，为天子树立一个广求贤士的姿态，并未受到实际的重视。

查文通篇都在论述高蹈丘园一类科目对唐人隐逸意识的鼓励和塑造作用，但却忽略了非常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此类科目在制举试中到底占据着怎样的地位？这个问题决定了此类科目究竟能对唐代士人的思想意识产生何等程度的引导作用。既然在唐代制举中，高蹈丘园一类科目仅处于非常次要的地位，那么其对唐代士人的吸引力就要大打折扣，因而认为其塑造了整个士林的隐逸意识的观点实缺乏说服力。

其二，制举诏令的发布大都出于现实政治的需要。

吴宗国先生指出，自仪凤后，制举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实行制举的诏令大多包含在大赦、德音一类制敕之中。查文认为：“后期制举的举行也日益变得常规化和可预期，意味着在帝王那里呈现某种疲态，它的活力远不如前期显著，所能起到的作用也更趋单一。尤其是它多半托身于帝王的大赦场合，使得天子对于士人赐予殊恩的意味更为突出。在这些大赦诏的行文中，‘高蹈不仕’、‘隐居丘园’之科往往先单独列出，特别强调对他们要‘以礼征送’、‘备礼邀致’。……后期的制举更突出地承担了传统征隐对士林隐逸风气所起到的效用。”事实上，制举诏命多在大赦、德音一类制敕中提出，恰说明制举的举行，往往是和一个时期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及现实政治的需要紧密联系在一起。因为，大赦、德

音一类制敕的发布，多在国家动乱之际或政治形势发生变化之时。出于政治需要，帝王号召沉沦草泽之士应制举试，是以功名来引导士人关心政治、积极入仕，为朝廷效力。恐怕不能因为诏命中有“高蹈不仕”、“隐居丘园”一类字眼就认为它鼓励了士林的隐逸风尚。恰恰相反，制举的这种发展趋势培育的是士人密切关注时事、积极参与政治的热情。

其三，唐代制举与现实政治的密切关系最集中地体现在，制举通常只有一个试项——试策。

制举一般只考对策，这一点已成为学界共识。唯天宝十三载词藻宏丽科，除策问外，还加试诗赋各一首，据说“制举试诗赋，从此始”（《唐会要》卷七六《贡举中·制科举》，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649页）。但现存材料并没有此后试诗赋的记载。策试一般由专人出题，皇帝偶尔也亲出试题。至于策问内容，随科目不同而有所不同，但从现存资料来看，都是针对现实政治问题，要求提出解决的方法。这在前后期都是一致的。应试者往往通过对策表达对当时政治的看法，主持者有时也通过策问，引导应试者申述政见，由此来发现人才，并体察舆情，改革弊政。元和元年（806），白居易与元稹为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曾闭户累月，试作了不少篇策文。白居易《策林序》说：“元和初，予罢校书郎，与元微之将应制举，退居于上都华阳观，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构成策目七十五门。”（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卷六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3436页）元稹在《酬翰林白学士代书一百韵》诗自注中也说：“予与乐天，指病危言，不顾成败，意在决求高等。”（《元稹集》卷一〇，冀勤点校，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7页）举子们要想求得高第，须得“揣摩当代之事”，在策文中“指病危言”，说明制举对策强烈的现实针对性。

中唐以后，随着政治腐败的日益严重，制举策问所提出的问题往往更加具体，举子们的对策也更加直言其事，对朝廷弊政的抨击也更加尖锐。这里举三个例子。一是元和三年（808）皇甫湜对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策文，将矛头直指宦官：“夫褻狎亏残之微，徧险之徒，皂隶之职，岂可使之掌王命，握兵柄，内膺腹心之寄，外当耳目之任乎？此贞夫义士所以寒心销志，泣愤而不能已者。”并指出因宠任宦官而使朝廷政事徒有空文、未收实效：“臣伏见赦书节文，周备纤悉。然空文虚声，溢于视听，而实功厚惠，未有分寸及于苍生。生德不宣，王泽不流，虽陛下寤寐思理，宰相忧勤奉职，不可为也。”（清徐松撰、

孟二冬补正《登科记考补正》卷一七，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版，第723—724、728页）这是唐代科举史上的一篇著名策文，针对中唐时宦官过分干预朝政的现实问题发表议论，敢于抨击当时政治的最大弊端，实属不易。

第二个例子是长庆元年（821）沈亚之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对策曰：

伏读睿问，周视圣旨，见陛下思天灾之病也，臣愚以为皆由尚书六曹之本坏而致乎然也。今请统而条指之。睿问有念人俗之凋讹，及于卒乘之数，货币之资，臣请以今户部、兵部之坏举之。睿问有思才周于文武，本固在于士农，臣请以礼部、工部之坏举之。睿问有欲以辨行之真伪，臣请以吏部之滥举之。睿问有朝廷之阙，臣请以刑部之失举之。（《登科记考补正》卷一九，第789—790页）

公然指出朝廷政事的各种缺失，都由于“尚书六曹之本坏而致乎然”，对当时尚书省行政系统的政绩提出严重质疑。沈亚之能够登科，正是由于他对时政弊端的尖锐批评。

到了文宗大和年间刘蕡对策，更将举策对时事的批判推向高潮。《资治通鉴》卷二四三大和二（828）三月：“自元和之末，宦官益横，建置天子在其掌握，威权出人主之右，人莫敢言。上亲策制举人，贤良方正昌平刘蕡对策，极言其祸。……（闰三月）甲午，贤良方正裴休、李郃、李甘、杜牧、马植、崔玘、王式、崔慎由等二十二人中第，皆除官。考官左散骑常侍冯宿等见刘蕡策，皆叹服，而畏宦官，不敢取。诏下，物论嚣然称屈。”（《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856—7858页）刘蕡的对策指出当时政治面临严重危机：“宫闱将变，社稷将危，天下将倾，海内将乱。”指斥宦官的专横：“忠贤无腹心之寄，阉寺持废立之权，陷先君不得正其终，致陛下不得正其始。”并提出扭转危机的办法：“陛下何不塞阴邪之路，屏褻狎之臣，制侵陵迫胁之心，复门户扫除之役，戒其所宜戒，忧其所宜忧！既不能治于前，当治于后；既不能正其始，当正其终；则可以虔奉典谟，克承丕构矣。”在政治极为黑暗的晚唐时代，刘蕡这样敢于直言的举子落第是必然的。由于刘蕡言辞过于切直，引起了宦官等黑暗势力的不满。这一事件可能对唐代制举产生了某种影响，因为现存资料找不到大和二年后实行制举的记载。《登科记考》唯于大中六年（852）列制科登第者莫宣卿一人，而设科不明，尚待确考。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制举与现实政治关系之密切。

制举试策与现实政治的密切关系还体现在，其策问

有时出自翰林学士之手。制举名义上由天子亲试，策问乃以天子名义发之，故有时即由在宫中任职的翰林学士起草，如同草拟制诰。翰林学士身处内廷宫中，在皇帝身边，为皇帝咨询，谋议朝政大事，处于当时政治的核心。制举策问由翰林学士来撰拟，这本身就说明试策与现实政治的密切关系，翰林学士所撰策问也往往更能围绕时政的核心问题发问。如陆贽于德宗贞元元年（785）在翰林学士任，是年九月制举试，就由他撰拟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博通坟典达于教化科、识洞韬略堪任将帅科策问。其《策问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曰：“然而浮靡不革，理化不行，暴乱不惩，奸犯不息。五教犹郁，七臣未臻。乡党废尚齿之仪，烝黎无安居之志。赋入日减而私室愈贫，廉察日增而吏道愈滥。意者朕不明与？何古今之事同而得失之效异也！思欲划革前弊，创立新规，施之于事而易从，考之于文而有据。备陈本末，将举而行。无或惮烦，略于条对。”（《陆贽集》卷六，王素点校，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86—187页）所提问题较为具体而又切中时弊，表明陆贽对当时政治弊病有着极为清醒的认识。这样的策问自然更有利于选拔具有较高政治才能的治国人才。

查文详细论述了制举诏书如何塑造唐人的隐逸意识，却对制举的试策只字不提。其实，诏书表述的只是冠冕堂皇的名目，试项才是制举试的核心和灵魂。既然最终决定等第高低的是应试者所作的策文，那么在整个制举过程中，试策对士人心理起到了最主要的引导作用。事实上，即使是幽素一类科目，其试策也同样是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的。如证圣元年（695）长才广度沉迹下僚科问：

洎乎嬴、刘以降，曹、马承流，罕为官以择人，直循资而就列。或十旬而登三事，或一日而致九迁，遂开趋竞之门，莫守代工之美。国家网罗群彦，驱驾时英，其政治于至和，其人淳于太古。今欲削汉、魏之遗法，复尧、禹之远图，能其事者永守其官，称其职者不迁其任。增秩赐爵，用申劝善之规；金帛玺书，载表优贤之义。变通之理，尚或多端，用舍之途，伫闻良策。（《登科记考补正》卷四，第134页）问及朝廷选官之法的弊病以及解决方略。张瀚对策曰：

今欲远服尧、禹之踪，近弃刘、曹之法，增秩

令其永任，锡帛许其不迁，使官不易能，职遵代掌，虽优贤之义有所会通，而随时之谈或恐未可。何则？太古敦朴，务静人希。敦朴则易淳，人希则易理，故不劳而功可就。今圣明抚运，俗阜才多。俗阜则事烦，才多则理剧。必咨明哲独任，不以避嫌。但使委得其人，数迁何妨化理？如其用失其理，久任岂废功亏？愚管所窥，以为如此。大体期于不滥，所务在于得贤。苟违此途，未知其可。（《登科记考补正》卷四，第140页）

否定了远袭上古任官之法的提议，并提出“大体期于不滥，所务在于得贤”的解决方法。

又如开元二年（714）策哲人奇士隐沦屠钓科问：

穆邦家而济生死，三圣之教何长？利动植而益黎元，五材之术何要？工商两业，在俗何先？文武二柄，适时何急？（《登科记考补正》卷五，第203页）问的是有关治国和教化的大政方针问题。孙逖对策曰：

务恬朴，贵清静，同术于汤之益谦，合志于尧之克让，此道教所长也。若乃不杀伐，证因果，包太空以为言，化群有而归寂，此释教所长也。皆能惩窒嗜欲，静镇纷躁，王侯得之，以贞天下。至于辨贵贱，立君臣，示之以好恶，因之以诛赏，使礼乐刑政灿然可观，则为善不同，其味相反，系风捕影，荡而无适。故知孔氏之立教，乃为邦之所急也。……国有六职，实载工商；时之二柄，莫先文武。……文德者，政之所专也；武威者，文之所助也。然则士农之末，作巧贤于鬻货；升平之岁，经国先于定功。（《登科记考补正》卷五，第209页）

分析了道、释、儒三教之不同作用，指出“孔氏之立教，乃为邦之所急也”；又对所问及的工商、文武等治国问题一一作出回应。策文表现出对于国家政治的强烈关注，并无“隐沦屠钓”的闲情雅趣。

总之，唐代制举从设科到考试都与现实政治密切相关，所有科目（包括幽素科等在内）选拔的都是高层次的经世治国之才，要求应举者有广博的经史知识和高明的政治见解，因而其所塑造的是士人积极参预政治的淑世情怀，而非隐逸意识。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